

汉唐时期的西域古代语文 及其对中国文明的贡献

耿世民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长期以来, 国人忽略了古代西域(新疆) 汉唐时期使用的几种语文——即吐火罗语与和田塞语。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已死亡近千年的语文被发现以来, 经过国内外学者几代人的努力, 人们重新认识了古代西域曾经存在过的辉煌文化和文明。这是我国大国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应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和重视。

〔关键词〕 西域; 吐火罗语; 和田塞语

〔中图分类号〕 H21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2) 02-0081-05

大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 有一支欧罗巴人经过长期的辗转跋涉来到我国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他们在汉唐时期曾创造出辉煌的文明, 留下相当数量的民族文献, 并对中国内地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疆考古学的诞生, 这些湮没在地下一千多年的宝贵文献也随之出土, 但无人能释读。

上世纪(1908年) 德国学者西格和西格凌(Sieg, Emil & Siegling, Wilhelm) 经过长期的努力, 终于成功释读这种已死亡的语言, 发表其划时代的文章, 题曰《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语, 关于一种迄今不知名印度——欧罗巴语的初步研究》(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äufige Bemerkungen ue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所谓的“吐火罗”语, 为我国汉唐时期西域(新疆) 焉耆、龟兹(现库车) 居民所使用的语言, 属于印欧语系在地球分布上最靠东的语言。其特点, 近于欧洲西部的语言(如凯尔特语[Celtic], 日尔曼语), 而与分布在亚洲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如印度、伊朗/伊兰) 相距较远。

这种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不仅保存其欧罗巴语言的特点, 而且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曾给予巨大的影响和贡献。于公元8—9世纪, 当回鹘(古代维吾尔) 人迁居新疆塔里木盆地后, 这些语言才逐渐消亡或融入后者。下面拟分若干小题略述这方面的问题。

一、“吐火罗”语的发现和研究

所谓的“吐火罗问题”是20世纪初提出来的。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 在新疆库车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一些桦树皮写本, 这些写本后被送到印度。经研究, 始知为迄今最古的梵文(Sanskrit, 印度古代书面语) 写本, 属公元4世纪, 遂引起轰动。为此, 俄国和英国当时驻喀什的领事彼德罗夫斯基(Petrovskiy)、马卡尔尼(Macartney, 汉文名马继业) 都奉各自国家政府的命令, 努力搜寻当时出土的古代写本。1893年, 时住印度加尔各答的梵文学家霍恩勒(Hoernle) 首次作阐明其内容的尝试。由于大部分写本是用印度学家熟悉的婆罗米(Brahmi) 字母写成(除和田地区出土的——部分用佉卢

〔收稿日期〕 2011-10-06

〔作者简介〕 耿世民(1929—), 男, 江苏徐州铜山县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Karoshthi 字母写成的写本以外), 所以在释读文字方面未造成困难, 但学者们很快就从中区分出两种尚不为人所知的古代语言。学者们暂称之为“不知名语言 I”和“不知名语言 II”。对于所谓“不知名语言 II”, 世界各国学者不久就达成共识: 她是一种塞 (Saka) 语 (属印欧语系中的伊兰语族东支), 因为这种语言的文献主要在和田地区发现, 所以前面加一限定语“和田”, 以区别于其他塞语。对于“不知名语言 I”的定名, 经过一百多年世界各国学者的争论, 直到今天尚不能说已完全解决。目前大家都习惯称之为吐火罗语或带引号的“吐火罗语”。这种语言又分为 A (甲) 和 B (乙) 两个方言 (实际上因它们之间区别很大, 可视作两种有亲属关系的独立语言)。我本人主张称之为古代焉耆 (即甲种吐火罗语) - 古代龟兹/库车语 (即乙种吐火罗语)。下面再就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简单介绍一下。

从一开始, 学者们已知道这是一种印欧语, 但不是东方的伊兰语, 而是像西方印欧语一样, 属于像日尔曼、意大利语一样的 kentum 语组。^①早在德国第四次考古队回国的次年, 即 1907 年, 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缪勒 (F. W. K. Mueller) 就首次发表为这种语言定名的论文, 题为《对新疆一种不知名语言定名的贡献》(Beitrag fuer genaueren Bestimmungen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 SPAW, 1907, S. 980 - 960)。他根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一书中的一则跋文,^②认为其中所说的 toxri 语, 就是中、西文献中提到的吐火罗语 (tokhar)。很明显, 缪勒的定名无非是根据二者在语音上的近似。次年 (1908 年), 德国梵文学家西格 (E. Sieg)、西格凌 (W. Siegling) (后来主要从事吐火罗语的研究) 发表题为《吐火罗语为印度—斯基泰语——对一种前所不知的印欧语的初步考释》(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aeufige Bemerkungen ue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 SPAW, 1908, S. 915ff.)。这里两位学者把吐

火罗语当作一种印度—斯基泰语显然是错误的。大家知道, 古代希腊人所说的“斯基泰 (Skythen/Scythen)”人等于古代波斯人所说的“塞人 (Saka)”。但他们对吐火罗语研究本身作出的巨大贡献, 是应该肯定的。他们除确定这种语言所具有的西部印欧语特点外, 还区分出相互差别很大的两种方言: 甲种/A 方言和乙种/B 方言。

1913 年, 法国学者列维 (S. Levi) 在《亚洲学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乙种吐火罗语为库车语考》(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A, 1913, pp. 311 - 380)。他根据历史材料, 令人信服地证明, 所谓乙种吐火罗就是古代龟兹 (今之库车) 的当地语言。^③对研究吐火罗语名称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篇论著, 为英年早逝的前苏联东方学家 V. S. Vorob'ev-Desyatovskiy 刊布的吐火罗语 B 方言和梵文两种语言对照的残卷, 题作《中亚文字残卷》(载 Uchenye Zapiski Inst. Vost. [东方学所学术札记], t. XVI, 1958)。在此残卷中, 梵文词 tokharika “吐火罗女人”用吐火罗语 B 方言词组翻译时, 使用了形容词 kucanne “库车的”。沃氏的结论是: kucanne 为吐火罗语 B 方言的自称。这一点也为不久前刊布的吐火罗语 B 方言与古突厥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中用古突厥语 Kūsān (即元代汉文文献中的“曲先”) 一名称吐火罗语 B 方言所证明 (参见 Tuerkische Turfan - texte, IX, ADAW, 1956)。这样, 操吐火罗语 B 方言的人称自己的语言为“库车语” (回鹘语译者也随之这样称呼)。

之后, 西格、西格凌虽承认 B 语应为库车语, 但仍坚持 A 语应称之为吐火罗语。同时提出 A 语作为宗教语言是历史上从吐火罗斯坦 (今塔吉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区) 带到焉耆、吐鲁番地区的。^④

总之, 为什么回鹘人称古代在焉耆、高昌一带使用的这种印欧语为 toxri (吐火罗语), 这是一个迄今尚不能给出满意回答的问题。事实上《九姓回鹘可汗碑》等粟特语文献也把焉耆一带

① 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家根据“一百”这个词起首的字母是 k 抑或是 s, 把整个印欧语分为 kentum 或 satem 两大组。一般说欧洲的印欧语属于前者, 亚洲的印欧语 (如印度、伊朗) 属于后者。

② 那里说该书是从 toxri 语译成回鹘语的 (toxri tilindän uighur tilinchä äwirmish)。

③ 汉文译文载伯希和等著, 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 中华书局, 2004, 页 53。

④ Sirg, Siegling: Und dennoch “Tocharisch” (反正还是吐火罗语), SBAW, 1937, S. 130—139。

称作“toxri”(ctw'ṛ twxry)。

一些学者还认为,在古代楼兰一带出土的近千件用佉卢文(Karoshthi)、世俗梵语(Prakrit)写成的木简中有近百个不明来源的词,为第三种“吐火罗”语(吐火罗C),应为楼兰国的当地语言。最近笔者读到瑞士学者包默尔(C. Baumer)的新书《丝绸之路南道——湮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古代文化》(Die Suedliche Seidenstrasse—Versunkene Kuluren der Wueste Taklamakan. 2002,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 出版社),他也接受古代楼兰人说的语言为第三种“吐火罗语”的观点,并认为月氏是“吐火罗”的一部分。我则认为“吐火罗人”是月氏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二、“吐火罗”民族的起源

有的学者提出吐火罗就是我国史书中的大月氏。英国剑桥大学已故教授贝利(H. Bailey)巧妙地解释说,从伊兰语的角度,Tokhar一名中的to,可解释为“大”,khar可对应“月氏”。希望我国研究汉语古音的学者能在这个对音问题上有所贡献。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大月氏的确和吐火罗/吐火罗斯坦有关系。根据汉文史料,大月氏原居住在甘肃祁连山敦煌一带。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或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西迁到吐火罗斯坦。其后代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贵霜(Kushan)帝国(一到三世纪),但汉文史书仍习惯上称之为大月氏。

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曾两次提到靺货逻(吐火罗),一为靺货逻国(即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另一为靺货逻故国(在今新疆南部民丰县北,约当今天的安得尔Endere)地方。

我很欣赏贝利教授“大月氏即Tokhar”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许多说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许多年前,我在前苏联《东方学问题》(Problemy Vostokovedenii, 1958?)上读到一篇关于大月氏西迁的文章。文章证明,两千年前敦煌至西域南北道的生态环境远比今天要好,众多人员和牲畜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据我所知,晚至20世纪30年代,大批哈萨克人连同牲畜一起尚能从新疆哈密北巴里坤县迁徙至东南的敦煌一带,即现今肃南阿克塞哈萨克自治

县)。还有一个前人不注意的问题,就是从甘肃的姑藏(*Kuzan)到新疆吐鲁番的古名“车师/姑师”(*Kushi),到龟兹(Kuci)/库车(Kucha)/曲先(Küsan)(元代前后回鹘语的名称),乃至远至中亚费尔干(Fergana)的古都贵山(*Kusan)城,再到贵霜(Kushan)/大月氏帝国,这些地名发音上的近似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否与月氏的古音*Kushi/*Kusi/*Kuti有关系?许多年前,当我在德国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突厥学和阿尔泰学(现改名为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进行工作访问时,曾看到痕宁(Henning)一篇征求意见的论文打字稿(听说后发表在Witfogel的纪念论文集中)。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古代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文献的记载,远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前,有说古代印欧语的Kuti和tukri两支人(他们经常一起行动),从遥远的小亚细亚东迁到新疆和甘肃一带。痕宁认为这里的Kuti就是月氏,Tukri就是回鹘文献中的Toxri/Tuxri。

另一理论认为“吐火罗”人的原居地在南俄草原一带,与古代欧亚草原北方的Afanasievo文化(距今约四五千年)有渊源关系。后他们经过西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南下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并越过天山,进入甘肃和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北部。

这里尚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古代焉耆-龟兹人是“吐火罗”人最先进入塔里木盆地族群的后代,抑或是大月氏于公元前二世纪被匈奴人打败后西迁大夏时留在当地人的后代?我认为两种可能都存在。

三、开展吐火罗学研究的意义

上一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几位国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等)都曾对西域古代语言文学(包括吐火罗学)的研究做出过贡献。前者曾撰写专文,论述古代西域戏剧对内地汉族戏剧发展的影响,后者在国外留学期间曾学习若干种西域古代语文并收集了有关方面的专业书籍,回国后他把藏书关于古代回鹘语文的德文图书捐献给了北大东语系(笔者青年时期曾从这批图书中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古代西域的语文、宗教、文化(特别是“吐火罗”语)曾给予内地的汉族语

言、宗教、文化以很大的影响，如汉语中的“佛”、“出家”、“和尚”等词语分别来自古代西域龟兹（库车）语、于阗（和田）语。古代西域佛教大师如龟兹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于阗人实叉难陀（Sikshananda）等也都曾对汉文佛典的翻译和著述先后做出过巨大贡献。另外据专家们的研究，汉语中的“蜜”、“狮子”等词语都来自“吐火罗”语。中国古代战车的出现和使用也与“吐火罗”人有密切关系。唐代宫廷十部乐中的若干部也来自“吐火罗”人的音乐（龟兹乐）。

四、和田塞语的发现与研究

西域古代语文除上面所说的吐火罗语外，尚有一种已死亡的重要语文，即古代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使用的于阗/和田塞语。关于和田塞语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近代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为古代于阗/和田语文的发现和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和田及其周围地区以及敦煌千佛洞等地发现了一种用古代婆罗米文（或称婆罗米文中亚直体）写成的大量写本残卷，是一种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语言。开始时，人们既不懂这种语言，也不知如何称呼它，德国人劳依曼（Leumann）起初称它为“第二种不知名语言”（Unbekannte Sprache II），稍后又改称为北亚利安语（Nordarisch）。因为他认为这种语言构成亚利安（Arian）（即印度—伊朗^①）语中的第三支（除印度和伊朗语外）。劳氏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北亚利安”一名也早已为人们所抛弃，但他首先解读了这种语言。

实际上这种语言为一种东伊朗语（Eastern Iranian），它在结构上具有更多的古代伊朗语的特点，因为在词汇中有许多印度语借词，所以使得初看起来不像伊朗语。

1914年挪威的斯坦·寇瑙（Sten Konow）发表题为《和田语研究》（Khotan Studies，刊于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论文，证明这种语言为古代和田地区当地居民的语言。由于它是一种古代塞（Saka）语，所以也称之为和田—塞语，以示区别于其他塞语。

现存古代和田—塞语文献多属3至11世纪初，参看贝利（H. W. Bailey）文，载《英国王家学会会刊》（JRAS），1972年第二期，103页。古代和田—塞语在语言方面存在方言（或时代上的）差别。据近年来的研究，巴楚的塞语与和田塞语有很大的差别，代表一种较古的语言发展阶段。此外和田塞语本身又分为古代和田塞语和晚期和田塞语两个阶段，其间差别变化很大。目前尚不见喀什塞语文献出土报告。根据一些零散的材料判断，唐代喀什地区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也应为塞语之一种。

目前刊布的古代和田塞语文献日益增多，内容有佛经、医学文献及世俗文书等，参看贝利（H. W. Bailey），恩默瑞克（R. Emmerick）等人刊布的文书及译注。佛经有《金光明经》（Suvarṇaprabhāsa-sūtra）、《僧伽吒经》（Saṃghāta-sūtra）、《佛本生赞》（Jātaka-stava）、《普贤行愿经》（Bhadracaryādeśanā-sūtra）、《金刚经》（Vajracchedikā-sūtra）、《无量寿经》（Aparimitāyus-sūtra）、《大般若经》（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妙门经》（Sumukha-sūtra）、《观自在菩萨赞》（Avalokiteśvara-sūtra）、《法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等；医学文献有著名的《医学精粹》（Siddhasāra）等。现存藏文的《于阗国史》等，有的学者认为应是译自古代和田语（原文已不传）。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些用古代和田语写成的原作诗歌。例如一位古代和田诗人歌颂春天的诗（原写本现存俄国圣彼得堡，编号为E21），一位当时嫁到甘肃沙州的和田王Shanira的女儿写给其父母的怀念家乡的诗（原写本现存法国巴黎，编号为P2027），以及其他一些抒情诗。

用古代和田语写作的作家有实叉难陀（Sikṣānanda）、提婆般若（Devaprajña）、尉迟尸罗（Vedyeśīla）等人。后者用诗歌体创作的《Jātakastava》（佛本生赞）长达六百多行，尤为珍贵。

关于和田—塞语文献及研究情况，详见恩默瑞克撰《和田语文献指南》（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东京灵友会刊，1979）。关于敦煌卷子中和田文

^① 这里笔者不使用“伊朗”，而使用“伊朗”一名。因为前者为国家名，而后者为语系/语支名。世界大语系之一的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语系包括位于欧洲的日耳曼、斯拉夫、拉丁，位于亚洲的印度、伊朗等语支。

书转写及译注情况，详见德莱斯登（J. Dresden）《和田文书草目》（载 *Acta Iranica* , XII, 莱顿, 1977）。

由于佛教传入古代和田地区的时间早于内地，所以和田佛教曾给内地佛教以巨大影响。在法显、玄奘之前，所谓到西域求经的僧人实际上就是到和田求经，如朱士行等。一些著名的佛教大乘经典实际是在和田制成，如著名的《华严经》等。

19 世纪末以来，由于西域古代语文（“吐火罗语”、和田语、楼兰语/尼雅俗语、粟特语、突厥一回鹘语等）文献的发现和释读，在汉学领域中形成了一支单独的学科——西域语文学

（*Philology of Serindia*）。我认为这一学科应是我国大国学（包括民族语文学或民族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学科迄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一些语种（如“吐火罗语”等）在季羨林教授去世后几乎成为绝学。反观国外，位于北极附近的冰岛首府雷克雅维克（*Reykjavik*）大学从 1987 年就开始出版专门研究“吐火罗语”的刊物：*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面对这样的现实，值得国人深思！

最后，希望我国在开展古代西域语文学方面能有所作为！

Languages Us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during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GENG Shi-min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Languag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languages, such as Tocharian and Khotanese, us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Xinjiang) during Han and Tang Dynasties were ignored by researchers. It has not been realized until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into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e traces of these already disappeared languages were discovered. Work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scholars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finally reveal the splendid culture and brilliant civilization that once exist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in ancient time. Domestic scholars should arouse the attention on the research of these languages since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country's sinology.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Tocharian; Khotanese

（责任编辑 白玉柱）